



当代中国文学,如果在题材范畴上谈论的话,最成功或者成就最大的,应该是乡土文学或后来被称作“农村题材”的文学。但是在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乡土文学是如何转向“农村题材”、“农村题材”怎样或为什么又重新转向了“新乡土文学”并没有得到说明。这相互关联的三个概念虽然有同源关系,但它们的内涵是非常不同的。“乡土文学”是指反映中国乡村社会面貌或社会性质的文学;“农村题材”是表达意识形态诉求的文学;“新乡土文学”是对“农村题材”的颠覆和对“乡土文学”的接续。这三种文学无论在观念上还在具体的创作方法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对现代文学或乡土文学的看法虽然并不一致(比如蹇先艾在《文艺报》1984年第一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20年代并……没有乡土小说流派。见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但以鲁迅为代表的众多作家作品的存在是文学史实,受鲁迅影响的那些青年作家,写的也是“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也与“阿Q”有血缘关系,也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识,(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既有田园牧歌的描述,更有对国民性的揭示、剖析和改造的诉求。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延安的文学家们经历了一次走向民间的思想洗礼。这场运动之后,“五四”以来形成的知识分子话语方式实现了向民间话语的“转译”过程。贺敬之等的歌剧《白毛女》,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以及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陆续面世,特别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孙犁的《荷花淀》的发表,一种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出现了:他们是英姿勃发活泼朗健的二黑哥和水生嫂,他们告别了阿Q、祥林嫂、华老栓的时代,当然也告别了愚昧、麻木、混沌未开开性格,而成为有鲜明阶级意识和深明大义的新型农民。民粹主义文学在这个时代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毛泽东的新文化猜想初步得到了实现。当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发表之后,奠定了“农村题材”创作的基本模型:总体性的目标、史诗的追求、两个阶级的对立、农民英雄的塑造等,就成为“农村题材”文学的基本结构。1949年之后相继出版的《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风雷》《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就是

在我的理解中,赵树理是一位以辉煌的文学历成就与令人震撼的人生悲剧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特立独行的作家。

上个世纪30年代末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行列,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不久,他奉命担任烽火剧团团长,亲自改编出上党梆子历史剧《韩玉娘》和《郾官图》,带领团员们四处演出,鼓励群众与侵略者斗争的信心。后来,上级领导根据赵树理的特长,调他去做报纸副刊编辑。他非常投入地工作,以快板、鼓词、民谣、小故事为主,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广大普通群众,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这也是他后来多年坚持写作通俗化、大众化作品的起因之一。

文人相轻,古来有之。大城市有,解放区也免不了。那些立志追求高雅文艺的文人,总是看不上赵树理的通俗文艺,认为赵树理缺少深厚的文学修养,写不出高雅作品来,只能写些低层次读物。但是,赵树理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仍然坚持走这条路。1943年5月,他完成了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是确立赵树理在中国文坛上重要地位的作品之一,也是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小二黑结婚》的素材,是赵树理1943年初到辽县(今左权)下乡时获得的。当时他遇到一个到民主县政府告状的老乡,老乡说自己侄儿被几个村干部打死了。赵树理问是什么原因?老乡说出了经过——原来,侄儿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与本村的一位漂亮姑娘谈恋爱,但他们的家长却都不同意。男方的父亲为了省钱,给他收了一个9岁的童养媳;女方的母亲贪图钱财,将她许给一个富翁。同时,几个村干部也看上女方。女方不听从母亲的决定,也拒绝了村干部的追求,一心与男方好。于是,村干部怀恨在心,设计圈套将男方打死。赵树理非常同情这位老乡,帮他到县政府有关部门立案,最终是案件告破,坏人得到惩处。

赵树理从这个事件中看出农村封建思想的严重性与基层村干部的低素质问题,感觉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他考虑,如果只表现案件本身,肯定不会有多少深刻意义,最多是个坏人逞凶、好人受害的老故事。应当抓住封建迷信与婚姻自主这对矛盾设置情节。这样,作品就能切合群众的生活

经典作家专刊

赵树理现象综论

□孟繁华

这样的作品。

1978年代以后,人们发现,在那条“总体性目标”的道路上并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中国广大农村不仅依然破败,农民依然穷困,而且在精神领域同样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们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等作品中看到的情景是:贫困无助的许茂依然是华老栓或祥林嫂式的愁肠百结;盘青青依然生活在精神的不毛之地,作为知识分子的李幸福,面对盘青青的不幸同当年的萧涧秋一样束手无策,王木通的愚昧、无知和自以为是,比阿Q们有过之无不及。正是从这个年代起,“农村题材”所遵循的创作观念和方法逐渐淡出,“新乡土文学”开始与当代中国乡村生活缓慢地建立起了联系,同时也接续了现代乡土文学的传统。

在这一题材创作中,赵树理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一方面,他是成功实践《讲话》、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赵树理的方向”被肯定为所有作家都应该学习和坚持的方向;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屡屡遭到批评/肯定的反复过程。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对赵树理本人来讲是痛苦和不幸的,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而言,赵树理的遭遇恰恰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从20世纪40年代走向文坛开始,赵树理的写作就一直注意与农村、农民和现实的关系,注意对民间文艺传统的借鉴和改造,注意按照《讲话》的要求为“工农兵”服务。并且因他的内容和形式,也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农村题材写作的作家。

赵树理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成长的有代表性的作家。1943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一周年的时候,赵树理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1946年8月26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文中盛赞《小二黑结婚》“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力),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重要,讴歌农民对恶霸势力的胜利。”在艺术上,“作者在任何叙述描写时,都是用群众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是充满了何等的魅力啊!这种魅力是只有从生活中,从群众中才能取得的。”而《李有才板话》,“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从《小二黑结婚》开始,赵树理成为实践《讲话》精神的楷模,是“方向”和“旗帜”,是一位“人民艺术家”。他的作品被视为人民文艺的“经典”。当然,也正是从赵树理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活泼、朗健、正面的中国农民形象,中国最底层的民众才真正成为书写的主体对象。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赵树理创作的评价开始发生了分歧和反复。这不仅与赵树理在这一阶段的创作有关,而且更与激进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有关。1955年1月,《三里湾》在《人民文学》杂志连载,5月出版单行本。这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篇小说。但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和较大规模地反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优秀作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编写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63年,第45页)小说是以三里湾的秋收、扩

社、整风和开渠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以“一夜”、“一天”、“一个月”为时间线索来结构作品的。小说叙述了三里湾四个不同家庭在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矛盾和变化。支书王金生一心带领全村人走合作化和共同富裕的道路;村长范登高则满足于自己的致富,有严重的私有观念。小说围绕这一矛盾,交织着四个家庭青年一代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农村所有制变革中的思想和观念的斗争,表现了家庭、婚恋、道德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同时也提出了推广农业技术、培养农业人才的问题。在艺术上,小说注意运用传统的民间说书手法并加以改造,通过完整连贯故事情节展开人物性格,语言机智幽默。表达了作家对民族化、大众化道路的一贯坚持。

小说发表之后,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批评者大多沿着相同的路线斗争的思路,认为小说中“当前农村生活中最主要的矛盾,即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看不到富农以及被没收土地后的地主分子的破坏活动”,而且三里湾党的领导王金星对蜕化分子范登高表现得软弱,“没有流露出应有的愤慨的心情”等。(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7月号)1955年10月,赵树理针对批评发表了《〈三里湾〉写作前后》一文。这篇文章既可以看作是一个“答辩”,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检讨”。他陈述了写作经过之后,也谈了作品的“几个缺点”。他说自己在抗日战争初期是做农村宣传动员工作的,后来“职业”写作只能说是“专业”,做这种从工作中来的作者,“往往都要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而且要求速效。这本来是正当的,是优点”。但他还是检讨了三个缺点。其中“对旧人旧事了解得深,对新人新事了解得浅,所以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他接着解释说:“这一切都只能说是在创作之前的准备不充分,为了迅速地配合当前政治任务,固然应该快一点写,但在写作之前准备得不充分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赶紧把不充分的地方补充准备一下然后再写,而不是就在那不充分的条件下写起来”。(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5年第19期)

事实上赵树理对上述批评是不接受的,这不仅表现在赵树理在处理农村矛盾和人际关系时,仍然限于乡村的伦理秩序允许的范畴之中,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即便是农村的党员干部,也不可能因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其思想和精神就达到了与时代同步的水准。因此,在批评他的文章发表不到一年,在一次“双百方针”的座谈会上,他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我感到创作上常有些套子束缚着作家……有人批评我在《三里湾》里没有写地主的捣乱,好像凡是写农村的作品,都非写地主捣乱不可。”(赵树理:《不要有套子——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小说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座谈会上的发言》,载《作家通讯》1956年6期,《赵树理文集》第四卷)但赵树理这一内心压抑刚刚释放不久,对他新的质疑已经酝酿在急剧变化的形勢中。

对赵树理的再度批评,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提出。这次批评的缘起主要是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的发表。作品发表后,《文艺报》刊发了《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的文章(1959年《文艺报》第7期)。文章认为小说“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不符合农村现实,对劳动妇女和农村干部进行了歪曲污蔑。但不久《文艺报》又发表了王西彦的《〈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王西彦读完小说后,“内心充满喜悦,觉得是一篇很好地反映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文章几乎逐一驳斥了武养的观点。认为作品“成功地描写了农村社会里两个落后后的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王西彦:《〈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10期)并对轻率粗暴的批评风气提出了批评。对赵树理评价的变化和反复,事实上是文学观念的改变。这个观念主要是塑造什么样“人物”的问题。当代文学批评中经常使用的“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间人物”、“反面人物”等,已经将“人物”作了等级和类型化的区别

赵树理的文学道路和创作成就

□杨占平

现实,蕴含比较广阔的社会意义;而且,也容易出故事、出人物。不久,便写出了《小二黑结婚》。作品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取自那个案件,但绝不同于原型,结局不是悲剧,而是自由恋爱取得了胜利,成为大团圆。这样写,既宣传了破除迷信、婚姻自主的思想,也符合人们的阅读心理愿望。

《小二黑结婚》引起的强烈反响,带给赵树理许多荣誉,但他并没有满足,又思考写作新的作品。那时,根据地农村的中心工作是减租减息,这是触动农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边区政府对此项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实际落实却非常复杂。土地所有者从个人利益出发,当然不愿意减租减息;农民由于多年的传统观念束缚,对减租减息持怀疑态度,害怕政策不能长久;各级抗日政府派出工作人员,有些出身于城市的同志对农村情况不熟悉,工作粗糙,使得减租减息不能正常发展……赵树理感觉这是个大问题,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他根据自己下乡时获得的素材,写出了《李有才板话》

《李有才板话》发行后,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不比《小二黑结婚》弱。赵树理的知名度更高了,原来对他坚持通俗化文艺道路有偏见的一些文化界人士,在现实面前不能不改变看法,承认赵树理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创作确实是一条路子。

赵树理接下去又创作出了《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催粮差》《福贵》等小说,他凭着自己的实绩,在中国文坛打出了一片天地,声誉与日俱增。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随工作单位进了北京。古都北京文化氛围浓厚,各路人才聚集,让赵树理这个太行山里来的农民大作家,既感到新奇,又有些不适应。他特意穿上了一身干

部服,摘掉多年爱戴的毡帽。可是,他说话浓重的晋东南口音,他待人处事的方式,却无法脱去乡村味。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文人圈的高谈阔论,让他常常产生困惑。不过,他对组织大众文艺创作却产生了兴趣,多方奔走,在中国文联和北京市委负责人周扬、李伯钊等的支持下,成立起“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持了好多活动,吸收了一大批人员,京剧名家梅兰芳、马连良、荀慧生和通俗小说家张恨水等都入了这个会;他创办了通俗化杂志《说说唱唱》,专门发表大众化作品,发现和培养出陈登科等一批青年作者。

到了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为了赵树理集中精力读书写作,调他到中宣部文艺处,摆脱了大量杂务;他先读了一个时期书,不久便离开山西晋东南农村深入生活,后来把工作经历调到中国作协,成为专业作家。

在生活方面,赵树理有了固定的收入,工资待遇都不低,在北京买了房子,接来了家属。按说,他完全有条件过舒适的日子。可他骨子里流着农民的血液,让他无法与城市融合。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的状态和农民的生活。从1949年进京,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15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如鱼得水般愉快。他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操心庄稼收成好坏,研究农业政策的实施,帮助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看到农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别欣慰;发现农民政策有误,农民利益受损害,他就忧心忡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

和划分。创造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的理论依据,来自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创造出“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有专门论述“新的人物”一节,“新的人物”在这里已解释为“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说:“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斗争和行动的时代,我们亲眼看见了人民中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伟大,他们正凭着自己的血和汗英勇地勤恳地创造着历史的奇迹。对于他们,这些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除了以全副热情去歌颂去表扬之外,还能有什么表示呢?”(周扬:《新的人民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16页)1953年9月24日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报告中又提出:“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同时反对人民的敌人,反对人民内部的一切落后的现象。”同年年底,冯雪峰发表了题为《英雄和群众》的文章,参加创造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他在论证了“创造正面的、新人物的艺术形象,现在已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要求,十分尖锐地提在我们面前”之后,也提出了如何塑造“否定人物的艺术形象”的问题:“从文学的社会教育的人物来说,描写各种各样的否定人物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是为了使读者认识,并鼓舞的斗争,是不能不在描写正面人物的同时也描写否定人物的。对于读者,不仅正面人物的艺术形象是教育和鼓舞的工具。一切否定人物的艺术形象也是教育和鼓舞的工具。”(冯雪峰:《英雄和群众》,《冯雪峰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4—75页)

这些论述使我们有可能理解“人物”创造问题为什么受到如此重视。在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的创造问题只有纳入到功能范畴内,它的重要性才有可能得到揭示。1962年,政治、经济的激进主义逐渐退潮后,文学界“现实主义深化”的问题也被提出。同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主持人邵荃麟发表了讲话。他分析当时的创作情况时认为,主要问题还是“人物创作问题”。因为“作品是通过人物来表现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茅公提出‘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型,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洪子诚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9页、437页)这一观念的提出,对赵树理的评价又发生了变化。康濯在《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中说:“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作家群里,应该说是近20年来最杰出也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小说大师。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点评价不足似的,我认为这主要是对他作品中思想和艺术分量的扎实性估计不充分。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础确如铁打的一般。”(康濯:《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5期)这样的评价在“文革”前又被否定,“中间人物论”也被作为一种“修正主义”的文学观念遭到清算。因此,多年来文学观念的“不确定性”,是评价作家矛盾和犹疑的根本原因。

对赵树理评价的反复和矛盾,是当代文学“犹豫不决”的表现之一,也是寻找“当代文学”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或“必要”的方式。事实上,赵树理坚持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捕捉最感性、生动的文学形象,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的。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之生动和鲜活,离开了他熟悉的农村生活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本来应该是给予鼓励的创作倾向,却因文学思想路线和对文学要求的不断改变而变得迷离和困惑起来。因此,陷于这个怪圈迷惘和不解的就不再是赵树理一个人,而是整个文学界。

普通农民身上,旧的思想负担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需要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同时,也是他后来所坚持的“中间人物”思想的实践之作。他一直认为,农村中间人物是占大多数的,过分突出先进或落后人物,都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篇作品在后来的极左思潮中多次被批判,更证明了它是一篇优秀之作。

上党梆子剧本《十里店》,是赵树理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剧本创作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剧本体现出了赵树理的创作初衷,通过女主角马红英同一些不良风气作斗争,赞扬了知识青年在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批评了少数农村干部错误的工作作风,提出了要加强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问题。然而,剧团赴省里调演只在内部演了一场,就被勒令停止演出,因为有关领导认为《十里店》没有突出阶级斗争大纲,过分暴露了社会主义的黑暗面,英雄人物塑造的不够。尽管赵树理对这些意见并不认同,但是,为了能让剧作公演,他只好违心地作修改,在保持原来的基本构架前提下,适当减少了一些所谓黑暗面,增加了马红英等正面人物的戏。结果又被有关领导指责为不真实,仍然是通不过,要求继续修改。想不通归想不通,他还得一次次去修改,到修改完6次,还是没有获得通过。因为政治气候不可能让他这样的作家作品问世,这也正是他所感叹的,“我是死于《十里店》哪!”直到他逝世多年,“文革”结束后以后,《十里店》才获得公演的机会,第一稿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思想认知和艺术追求的作家,赵树理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文学史上取得了别人无法代替的地位,更缔造了山西文学的一次辉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山药蛋”文学流派。他的作品在国内产生过极为广泛的轰动效应,曾经影响过众多年轻的文学工作者,影响过一代文风。他的作品还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翻译出版,国外有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他的入生道路与作品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树理作品的价值,将会更加显现。

本专刊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协办